

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美]加布里埃尔·A. 尔蒙德 詹姆斯·S. 科尔曼 等著

任晓晋 储建国 宋腊梅 译

EDITED BY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詹姆斯·S. 科尔曼 等著
任晓晋 储建国 宋腊梅 译

EDITED BY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等著;任晓晋,储建国,宋腊梅
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

书名原文: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ISBN 978-7-208-14373-9

I. ①发… II. ①加… ②任… ③储… ④宋… III.
①发展中国家-政治-研究 IV. ①D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6801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 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 ·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詹姆斯·S.科尔曼 等著

任晓晋 储建国 宋腊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3 插页 2 字数 484,000

2017年3月第2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373-9/D·2998

定价 85.00元

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编委会

主 编

谭君久

编 委（以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陈 刚 储建国 刘俊祥 申建林 唐皇凤 谭君久 叶娟丽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武汉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985”工程二期拓展项目成果

总 序

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话题。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承认,今日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英文译作 **developing country**,与之相对的“发达国家”则是 **developed country**,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发展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通常,区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主要是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来判断的,为此人们提出了包括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NI**(国民总收入)、**CDI**(综合发展指数)以及国民幸福指数(**NHI**)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考究,汉语中的“发展”意味着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而 **develop** 一词在英文中的基本释义就是“(使)成长起来变得更大、更丰满,或者变得更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从这个意义上来阐释“发展中”和“发达”,就不能仅仅囿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判断,而应全面地、综合地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水平来理解。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适时的政治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而严重滞后的政治发展则可能拖延和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相对说来,今日之中国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政治发展的任务。

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民主进程、法制化所达到的水平,民主所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等等,与六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不少进步,但同时也应该承认,离广大人民的期盼、离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求和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不体察这种距离,是很危险的。

和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同样意味着要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尽管这个进程在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国情,会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人对政治现代化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不同,譬如,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前景,政治发展的过程和形式,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政治体系的综合能力,社会的组织化和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政治意识的普及和政治文化的改造,等等。但是,人们对“政治现代化”这个总的发展趋向大概不应该有什么异议。而对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表现,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一般应包括民族国家的构建、民主化、法治化,尽管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形式,确定不同的具体指标。

不用讳言,关于政治现代化的种种概念,并不是产生自中国本土的,而是“舶来”的。中国的近代发展过程,就是先是落后挨打,然后学习欧美的过程,不仅学习欧美的船坚炮利,引进欧美的科学技术,也学习欧美的政治制度,引进欧美的社会、政治观念。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人学习的对象也进一步扩展,不仅学习过欧美,也学习过苏俄,而后也学习其他新兴国家的经验。

学习外国,译书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就是从翻译开始的。翻译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学习交流的必不可少的桥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古代中原的汉族与周边的其他民族之间,中国古代的统治政权与其他国家之间都保持了频繁的往来,因此,远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语际的翻译活动,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但据说,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华夏之外的语言的翻译工作始于西汉哀帝时期,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

“五四”的西学翻译。明代以前，中国人的翻译活动基本上限于佛经翻译，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作品，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鸦片战争前后，有了魏源等人介绍英、美、瑞士等国的议会制度，林则徐请人翻译了瑞士人瓦特尔编的《万国公法》，但大量翻译介绍西欧经济、政治学说则是戊戌变法之后，而其中最大贡献者当属清代“新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严复。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密尔(旧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欧洲近代的经典著作，开启了引进现代政治观念的大门。严复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总结了翻译的经验，提出了翻译的标准，这就是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尽管今人对“信、达、雅”这三个字的理解比当初严复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信、达、雅”作为对翻译水准的追求一直为负责的译家所认同和坚守。人们接触域外的政治学原著先是阅读，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能阅读不等于能翻译，从阅读到翻译之间其实有相当的距离，要经过十分艰难的努力，要求译者的专业知识和双语语文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一般的阅读，可能并不一定要把每一句话都读懂，可以一目十行，明白其基本要义即可。翻译就不同了，必须句句到位，不仅字、词、句都得落实，疏通上下文，还要明白文字的语境，了解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背景，在充分理解了原文后，要用自己的母语准确、顺达地表达出来，这就不容易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阅读一本译著，读了半天却读不大懂，文字别扭，语义不通，如果找来其原著看看，反而一读就懂了，这时就免不了会质疑译者的水平和责任心。因此，瞧不起翻译的想法当然是要不得的，而对于译者来说，忽视翻译的艰难，随意下手更是更要不得的。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介绍的领域遍及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翻译出版空前繁荣。武汉大学的政治学同仁这些年来一直积极致力于介绍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翻译了一批有影响的外国学者的政治学著作，如《美国式民主》、《多头政体》、《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权力与财富

之间》等,同时,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我们在研究生中开设了“政治学英文文献翻译技巧与实践”课程。“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就是武汉大学政治学同仁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推出的一个翻译系列。我们希望,这个系列的推出将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有所贡献,我们也希望,这个译丛能够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有所贡献,并得到学界的检验、批评和指教。

谭君久

2011年8月于珞珈山麓

前 言

本书旨在达到两个目标。首先,建立一种理论框架,从而第一次使所有种类的政治体系之间的比较分析方法成为一种可能。其次,对世界上那些正在发生戏剧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地区——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体系作出比较分析。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教授的导论“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研究法”论述了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本书在建立分析框架时所运用的大量思想和创意都反映在这篇导论中。这一概念体系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本书所涉及的地区性范围。它标志着我们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面或许正在接近一场革命。

在这个帝国衰亡、国家奋兴的时代,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的比较分析——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和展望这些新的政治实体,我们就需要一些手段,借以描述这些新的政治实体在功能范畴中的特性,并且对它们做出一些概述。过去,我们关于这些政治实体的知识主要是用标准的和约定俗成的词汇来表达的,它完全掩盖了那些在具体情况下可以影响政治行为的因素和利害关系。然而本书有关各地区的章节,以及詹姆斯·S. 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教授用以总结本书所论及的各种政治体系的典型特征的最后一章,却向我们展示了功能研究法可以取得的成果。

几年以前,在阿尔蒙德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几位成员之间,稍后,又在阿尔蒙德教授和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该委员会亦属

■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于由阿尔蒙德教授担任主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几位成员之间，曾经进行过一场漫长而又非正式的讨论。本书的缘起即可以追溯到这场讨论。国际研究中心和比较政治学委员会都向本项目提供了研究设备和资助。本书的出版归功于它们共同的赞助。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弗雷德里克·S. 邓恩(Frederick S. Dunn)

1959年12月1日

序

本书缘起于几年以前发生在本书的三位合作者——即那时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卢西恩·W.派伊(Lucian W. Pye)、丹克沃特·A.拉斯托(Dankwart A. Rustow)和我——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的讨论。讨论的起因是社会科学研究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一些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强调了在国外政治体系研究中由“地区性研究”方法转移到一种真正的比较和分析方法上来的重要性。我们三个人中有两位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成员。根据他们的倡议,一批专家学者接受委托开始编写一系列的地区性备忘录。要求是在地区性政治分析中采用一种共同的框架和一套相同的范畴。

这项工作的理论方法发端于1955年6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政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会议。会议是由社会科学研究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和政治行为委员会发起的。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有两篇在政治体系的比较上尝试应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及概念:一篇是弗朗西斯·X.萨顿(Francis X. Sutton)的“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另一篇是我的“比较政治体系”。

1956年至1957年,我有幸获得了研究员基金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了一年研究工作,其间有机会在政治比较问题方面做了进一步尝试。在一系列探讨原始政治体系的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些人类学家,包括约翰·怀廷(John Whiting)、比阿特丽斯·怀廷(Beatrice Whiting)、金博尔·罗姆尼(Kimball Romney)、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这个小小的研究班为临时性的讨论提供了机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和罗伯茨聚在一起,试图阐明原始的和现代的政治体系所共有的特性,我们当时计划的项目——大家一起合作写一本有关原始政治体系的小书——目前还未有成果推出,但由那些研讨会和讨论所促成的思想及概念却在本书的理论介绍中被加以吸收、发挥和改进。我们在此处所采用的政治比较的功能研究法就是在那些讨论中发展成型的,尽管它的起源还可以更早地追溯到伯纳德·C. 科恩(Bernard C. Cohen)和我本人于1952年至1953年间在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做的共同努力。

当我们的手中有了这些为数不多、仍然粗疏毛糙而且定义并不严谨的理论范畴之后,本书的合作者们应国际研究中心的邀请聚集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会议是在1957年的秋季;第二次是在1958年的春季。在这些拟定编写计划的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功能范畴,提出了利益集团和政党制度等结构范畴。地区性备忘录的初稿得到了评审和修改。同时,科尔曼同意作为本书的另一位主编,编写本书的结论性章节,专门探讨所有非西方的政治体系的共有特征,在这些地区可以找到的各种政治体系的类型,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特征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会议之前,在本书的合作者们中间散发了一篇备忘录。本书的理论章节即从这篇备忘录发展而来。在地区性章节完成后,理论章节的内容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因此,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功能理论虽然在每一单独的地区性章节中并没有完全展开,但是,这些功能范畴提供了基本的概念,由此可以分析各种地区政治体系的实际表现。

本书还有一个缺陷也需要进行解释。无论是在理论性上还是在地区性章节中,本书的重点大多是放在政治的功能和结构之上,而非放在政府的功能和结构之上。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宪法和正式的政府机构的变化过于频繁,通常与政治体系的实际表现并无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对此进行详细的描述无助于预测这些体系的行为。这些欠发达地区的政治体系处在迅速的变化之中。如果我们想要提高自己解释和预测这些政治变化的方向的能力,尤其是想要展望这些地区的民主现代化进程,更重要的问题是分析它们的传统文化、西方对它们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影

响、它们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实践以及它们的政治“基础”——利益集团、政党和传播媒介。

本书的合作者们有充足的理由表达他们对于那些并没有参与这一特殊工作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成员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在这里所采用的许多概念都曾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或在委员会发起的会议上讨论过。泰勒·科尔(Taylor Cole)、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盖伊·波克尔(Guy Pauker)、罗伊·麦克里迪斯(Roy MacRidid)、乔治·麦卡特·卡欣(George McT. Kahin)和沃尔特·夏普(Walter Sharp)(在本项目日趋成熟期间,他们都曾在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任过职),还有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和布赖斯·伍德(Bryce Wood),他们都曾积极参加过这些会议。正如所有富有创造性的集体活动一样,人们很难确定究竟是谁可能第一个表明了某种思想或某种概念,并且将功劳归属于他。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本书每一个具体部分中所出现的理论阐述,都由其作者全面负责。我们还想对国际研究中心及其主任邓恩以及副主任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表示谢忱,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中心的设备和资源,使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事业。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1959年12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序 /1

导 论：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研究法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1

第一节 政治体系 /3

第二节 政治体系的共同特征 /7

第三节 政治体系的功能 /22

第四节 政治体系盖然论探索 /53

第一章 东南亚地区的政治 卢西恩·W. 派伊 /61

第一节 背景 /61

第二节 变化的过程 /87

第三节 政治集团和政治功能 /95

第四节 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 /118

第五节 政治整合 /125

第二章 南亚地区的政治 迈伦·韦纳 /134

第一节 背景 /134

第二节 变化的过程 /148

第三节 政治集团与政治功能 /160

第四节 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 /201

第五节 政治整合 /205

第三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 詹姆斯·S.科尔曼 /214

第一节 背景 /214

第二节 变化的过程 /233

第三节 政治集团 /247

第四节 政治功能 /275

第五节 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 /301

第六节 政治整合 /311

第四章 近东的政治 丹克沃特·A.拉斯托 /320

第一节 背景 /320

第二节 变化的过程 /333

第三节 政治集团与政治功能 /338

第四节 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 /386

第五节 政治整合 /392

第五章 拉丁美洲的政治 乔治·I.布兰克斯坦 /398

第一节 背景 /398

第二节 变化的过程 /410

第三节 政治集团与政治功能 /417

第四节 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 /449

第五节 政治整合 /455

结 论：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体系 詹姆斯·S.科尔曼 /463

第一节 引言 /463

第二节 变化的过程及其政治意义 /467

第三节 政治体系的功能 /474

第四节 各种政治体系的功能概说 /487

附录 /505

译后记 /511

导论：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研究法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根据一套共同的范畴,对“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在这个方面,本书是一个创举。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有必要对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做一些探索。在政治主导西方文化领域的漫长历史中,原有的标准用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学者们只须在心底里牢牢记住西欧文化领域中的历史和人类学知识,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府机构功能特征的总体变化就不会对现有词汇造成太大的压力。学者们在工作中进行着校正,一边增加词汇的经验主义功能,一边对一些标准用词发出疑问:他们比较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依据历史的经验以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差异进行推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因果关系的解释。

然而,尽管这门对政府加以比较的学问在它所统辖的特殊领地里显然处于良好、健康的状态,但是在过去的50年里,政治科学的概念体系已经逐步丧失了它的能力,甚至无法应付西欧政治的现象。三权分立的概念和代表的概念产生于一个选举权范围相对还十分狭小的时期,那时的公共事务还垄断在贵族或中产阶级的显要人物手中,政党和利益集团还只是非正式的和极为有限的现象,所谓的“公众”也只是局限于有产者和有文化者。从那时以后,选举权开始具有普遍意义,政治录用失去了它的阶级特征,政党发展成了正式的和群众性的组织,结社利益集团出现了,全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得到了发展。这些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却并没有相应地产生经过深思熟虑的概念调整。直到最近所做的实验开始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尽力使用一套标准的和约定俗成的词汇去处理现代世界复杂的政治现象。

为了找到合适的概念和范畴,以便我们能够比较那些在规模、结构和文化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且不说该怎么去适当地讨论我们所熟悉的西欧现象——我们已经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寻求帮助。本书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诸如“政治体系”、“政治角色”、“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和“政治社会化”,就已经在这些领域的学者们中间获得了某种流通性。也许可以说,它们的实用性已经得到了检验。至于我们在本书中引入的其他范畴,它们只是在目前这批合著者们的专业分析里进行了初步的试验。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使用这些术语所反映的那种寻找新概念的努力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它反映的是一种潜在的动向,是一种新的和协调一致的思考及研究政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类似“行为研究”这样的标语中已有所暗示。当我们把新的术语和旧的术语加以比较时,就会有这种建立一个新的概念统一体的冲动。因此,我们倾向于使用“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而不再使用“国家”(State)这个受到标准和约定俗成意义限制的概念;我们开始倾向于使用“功能”(Functions),而不再使用在涵义上同样是一个标准概念的“权力”(Powers);我们倾向于使用“角色”(Roles),而不再使用“职责”(Offices),这又是一个标准词汇;我们用“结构”(Structures)代替了“制度”(Institutions)这个同样将我们导向正式标准的概念;我们不再使用在意义上显得既正式又理性化的“民意”(Public Opinion)和“公民训练”(Citizenship Training),而倾向于使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和“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我们并没有把作为一门科学的公法和哲学抛弃在一边,我们只是告诉它们能够挪一下位置,为早就应该得到发展的政治理论腾出一些空间。

如果我们稍作停留,考虑一下这些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是如何地基于“行动”和“行为”的基础之上,它们是如何一个暗示着另一个,它们对社会进程中其他的组成部分又是多么地开放,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并不只是简简单单地为旧的词汇表增加新的术语,相反,我们正在发展或改编一种新的词汇表。我们不妨亮出所有的底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性词汇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本质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虽然在政治科学领域里出现的极少数几个形式逻辑学家快乐的